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育心理學報，2012，43 卷，3 期，701-716 頁

事件威脅性、關係親近性與謙虛取向對大學生橫向傑出成就之人際歸因的影響*

韓 貴 香

淡江大學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本研究旨在檢視大學生對自身成就的人際歸因方式和歸因動機，是受成就事件本身的類型（橫向傑出，較無社會比較意涵）或人際關係的特性（事件威脅性與關係親近性）影響，同時探討成就者的歸因方式是否受其內化的謙虛取向影響。本研究以新北市一所私立大學的 200 位大學生為對象，回收有效問卷計 192 份。研究採情境實驗法，以事件威脅性與關係親近性為主要變項設計相關的橫向傑出成就情境。依變項為測量研究參與者在該情境下的人際歸因方式和歸因動機，並測量其謙虛取向程度。採卡方分析的研究結果顯示：當自己的成就會威脅到對方，研究參與者多將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運氣）；當成就不會威脅對方，研究參與者對成就的歸因，則受雙方關係的親近程度影響。當對方為關係親近者，傾向將成就歸因於內在因素（努力、能力）；當對方為非關係親近者，則是將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運氣）。採 *t* 考驗對謙虛取向分數的分析發現，大學生只有在自己的成就不會威脅到對方，且和對方為關係親近者時，其對成就採內在或外在的人際歸因方式才和個人的謙虛取向分數有關。在此情況下，謙虛取向分數愈高者愈傾向採外在因素歸因自己的成就。

關鍵詞：人際歸因、事件威脅性、橫向傑出、謙虛、關係親近性

一、研究動機

過去對於大學生對自身成就會如何進行人際歸因的探討，有以成就事件的類別是縱向傑出或橫向傑出來分析，其觀點是認為此兩類不同的成就事件本身具有的社會比較意涵並不相同，因此成就者會採內在因素或外在因素來向他人歸因自己的成就，是受到不同成就類別的影響。另一種觀點則著眼於人際互動的情境特性，認為成就事件本身的類別並不是影響成就者會採內在或外在歸因的主要原因，而是成就事件對此互動對象是否具有威脅性，以及此互動對象和成就者本身的關係親近性如何，才是影響成就者

* 本文通訊方式：jessyhan@mail.tku.edu.tw。

會採內在或外在因素解釋自己成就的主要原因。由於此兩種觀點強調影響大學生對自身成就做人際歸因的變項並不相同，此容易造成相關理論的混淆。因此，本研究擬進一步檢視大學生對自身成就的人際歸因方式（內在歸因或外在歸因）和歸因動機，是受成就事件本身的類型（橫向傑出，較無社會比較意涵）或人際關係的特性（事件威脅性與關係親近性）影響，同時探討成就者的歸因方式是否和其內化的謙虛取向強度有關。相信研究的結果，對於以此兩種不同的理論觀點來預測大學生對自身成就會採何種歸因方式的適用性，可以有更進一步的澄清。

二、文獻探討

長久以來，西方的研究即發現：人們在解釋有關自我成就的原因時，會有自利偏誤的現象（*self-serving bias*）（Zuckerman, 1979）。也就是說，對於自身的成就個人會傾向做內在歸因；反之，對失敗事件則是做外在歸因。內在歸因的內容包括了個人的能力和努力；外在歸因則主要是指環境因素，例如運氣或作業的難度等（Weiner, 2000）。就歸因的型態上來說，成就歸因可以簡單分為：「自我歸因」（*self-attribution*），指個人私下對自己的成就做歸因；「他人歸因」（*other-attribution*），指個人對他人的成就做歸因；以及「人際歸因」（*interpersonal-attribution*），指個人對他人解釋自己成就的原因（Hewstone, 1989）。不管是哪一種歸因型態，在概念上，將成就歸因於自己的內在因素（能力、努力），都被視為是一種自我增進（*self-enhancing*）的策略，可以增進個人的自尊或自我概念；反之，將成就歸因於外在自己無法控制的因素（運氣、作業容易），此在私下自我歸因的情況，被視為自我貶抑（*self-effacing*），因其否認自己與成就之間的直接關聯（Miller & Ross, 1975; Zuckerman, 1979）；但如果是在人際歸因的情境，對自己的成就做外在歸因則被視為「謙虛」，因其可能是受到人際互動情境中，個人想給對方留下好印象，或其他的情境相關因素影響所表現出來的客氣說法（Baumeister, 1982）。本研究所探討大學生對橫向傑出成就的歸因方式，即是指「人際歸因」而言，且特別著眼在人際互動情境中，該成就是否會威脅到對方（覺得被比下去），以及成就者和此歸因對象的關係親近性此兩因素可能具有的影響效果。

相關研究顯示，西方的個人在自我歸因其成就時，會傾向採能自我增進的歸因方式，亦即將成就歸因於自己的能力或努力，強調自己才是事件成功的原因（Miller & Ross, 1975; Zuckerman, 1979）。雖然對自己的成就做自我歸因，在概念上和個人會如何對他人解釋自己成就的人際歸因不同。但對在西方文化下成長的個人而言，由於個人主義強調個體的獨立自主與內在一致性，個人為維持其自尊或正向自我觀，偏好以正向的方式來肯定自己（Markus & Kitayama, 1991）。此外，社會讚許的自我呈現方式，亦鼓勵個人表現自信（Helmreich, Aronson, & LeFan, 1970）。因此，在西方的文化中，對自己或對他人解釋自己的成敗，一般而言，並不會有明顯的不一致，因為兩者均是採「自我增進」的方式進行。而此，和華人在對他人解釋自己的成就時，常常表現出謙虛的現象（Bond, Leung, & Wan, 1982; Crittenden, 1996），則有明顯的不同。

雖然西方學者認為：維持正向自我觀的需求，具有人類的普同性（Leary, 1999; Steele, 1988; Taylor & Brown, 1988; Tesser, 2000）。但持文化自我觀（*cultural-self perspective*）的心理學者，則有不同的看法，其認為：西方個人主義文化所建構的「獨立我」自我概念（*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強調自我肯定、競爭和獨立自主，在此文化下成長的個人自然重視對自我能力的評價和自尊的維持。相對地，東方集體主義文化下所建構出來的「相依我」自我概念（*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強調的則是為他人設想和人際關係的和諧。在此文化下成長的個人在意的則比較是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和評價，而非西方文化所強調的自尊（Heine, Lehman, Markus, & Kitayama, 1999; Markus & Kitayama, 1991）。相關的研究的確顯示，華人不管是對自己的成就表現做歸因或自我評量，都傾向謙虛和保守，而不若西方人般地自誇和自我增

進（樊景立、鄭伯壘，1997；Bond et al., 1982; Farh, Dobbins, & Cheng, 1991）。

（一）華人對成就的人際歸因

由於深受儒家文化影響，華人對自己的成就謙虛，基本上可以被視為是一種道德人格的追求。所謂「卑以自牧，自養其德」，藉由對自己成就的自謙、自貶，可以反映自己永遠有待改進的態度（胡金生、黃希庭，2006）。而此落實在和他人的日常互動時，便慢慢地成了個人對自己成就自表的一項社會規範。所謂「謙受益，滿招損」，在此「不讚己長」的社會規範影響下，華人傾向對自身的成就低調、保守，並認為此是個人良好教養的表現（王晴巧、孫蓓如，2007）。也因此，華人在和他人互動時，不若西方人偏好以內在因素來歸因自己的成就。

除了「不讚己長」社會規範的遵守，另一個常被拿來解釋華人對自己成就謙虛的觀點則是保護他人的面子。由於儒家社會互動的重心強調人際關係的和諧，個人在為人處世方面需處處小心，以保護對方的面子（彭泗清，1993；楊國樞，1992；Leung, 1996）。因此，當個人的成就隱含著互動對方的失敗時，基於同理對方的感受，華人常會以運氣來解釋自己的成就，並據此安慰對方不是自己的能力或努力高過對方，而是外在不可控制的因素「運氣」使然。

周欣樺（2002）的研究即發現：雖然在如大學甄試的人際競爭情境中，台灣的大學生會將自己的學業成就歸因於自己的努力，但在和同學相處的人際和諧情境，則是傾向將自己的同一學業成就歸因於運氣。也就是說，華人大學生對於自身成就的歸因，常受到當時所處的情境影響，當情境需要個人強調能力以爭取有利的結果，則謙虛並非合於此情境的適切反應；相對地，在人際和諧的情境，基於對人際關係的維持，謙虛便成爲一強而有力的社會規範。

不同於周欣樺（2002）研究操弄的情境，是個人爲了獲取想要的資源（大學入學甄試），因此會自我增進地對成就做內在歸因（努力）；反之，在人際和諧的情境，則是爲了避免自己的成就威脅到他人而謙虛地將成就做外在歸因（運氣）。韓貴香（2010）的研究則是以大學學測的表現爲研究情境，探討大學生在競爭獲勝後，如何對不同的他人歸因自己的成就以及其背後的動機有無不同。其研究所分析的人際關係特性有兩種，其一爲成就事件對歸因對象是否具有威脅性（同一競爭中的失敗者）；其二爲此歸因對象與成就者之間關係親近的程度。其研究結果顯示：當個人的成就威脅對方時，則不管和對方關係親近與否（好友 vs. 同學），研究參與者基於「體貼對方感受」，都是以外在因素的「運氣」來解釋自己的成就。當此成就不會威脅到對方時，研究參與者對成就的歸因，才受到與互動對象關係親近程度的影響。當對方爲關係親近者（父母），基於和對方「榮耀分享」，「努力」是最常被提及的理由。但如果對方爲非關係親近者（鄰居），則基於遵守「不讚己長」的社會規範，研究參與者選擇的主要歸因方式則是「運氣」。值得注意的是，此和成就事件對對方具有威脅性時，個人也是將成就歸因於運氣的情況並不相同，因爲在後者個人對自己的成就謙虛，是基於「體貼對方」的同理心。這樣的結果顯示，即使是在強調人際和諧的情境中，華人大學生也和西方人一樣，都有可能表現出強調自己優點的自我增進行爲。只不過由於儒家社會的氛圍並不鼓勵自誇，因此，自我增進的人際歸因方式僅表現在關係親近者之間。

（二）縱向傑出與橫向傑出

延續 Tafarodi、Marshall 以及 Katsura（2001）的研究將集體主義社會所追求的生活目標，分爲：「縱向傑出」與「橫向傑出」兩大類的想法。Hwang、Chen、Wang 與 Fu（in press）認爲儒家社會亦同樣存在縱向傑出與橫向傑出兩種成就目標。縱向傑出的成就目標是指社會大眾所普遍認可的成就，例如考上好的大學、上理想的系所，個人獲致這類的成就，通常可以得到整個社會的肯定和讚美；橫向傑出的成就目標則是指個人基於自身的興趣而追求的成就，例如在歌唱比賽或球類競賽中表現突出，獲致這類的成就雖然可以得到擁有相同興趣者的肯定，但其他的人對此成就可能就不會太在意。根據前述 Hwang

等人對此縱向傑出與橫向傑出所提的觀點，個人獲致這兩類不同的成就，對於其互動的同儕而言，應該具有不同的社會比較意涵，因此，成就者對這兩類不同的成就會採不同的人際歸因方式。

與縱向傑出和橫向傑出的概念接近，陳舜文（2005）認為華人的成就目標可以概分為「社會成就目標」和「個人成就目標」。社會成就目標是指內團體或社會重視的目標，且由內團體（如父母）設定表現目標與標準；而個人成就目標則是指基於個人興趣，由個人自行設定表現的目標與標準。由於個人獲致社會成就目標的成就，明顯會對互動的他者造成被比下去的社會比較效果，因此個人會傾向以外在歸因（運氣）的方式，來對他人解釋自己的成就。反之，個人成就目標的成就則因不是社會普遍追求的成就，而相對較無社會比較的意涵，因此，個人可以大方地以內在歸因的方式（努力），來對他人解釋自己的成就。其研究的確發現：華人大學生對於成就事件的歸因方式，要視成就事件的類型而定，對於「社會成就目標」如果歸因的對象是自己，研究參與者傾向歸因於「努力」，其次是「運氣」；如果歸因的對象是朋友，則是傾向將成功歸因於「運氣」。不過，如果成就事件的性質是屬「個人成就目標」，則當歸因的對象是自己，研究參與者會同時將成功歸因於「努力」和「能力」，但如果歸因的對象是朋友，則主要是將成功歸因於「努力」其次才是「運氣」。

（三）關係親近性與事件威脅性

前述韓貴香（2010）研究操弄的成就事件（大學學測），應是屬陳舜文（2005）所分類的「社會成就目標」以及 Hwang 等人（in press）所提的「縱向傑出」。若就研究的結果來看，雖然兩個研究的結果相似，成就者在人際歸因時多會對自己的成就謙虛。但針對此兩個研究比較，可以發現其不同之處在於：1. 陳舜文的研究並未探討成就者和互動對象之間的關係親近性；以及，2. 陳舜文的研究立論點在不同類型的成就事件（社會成就目標 vs. 個人成就目標）具有不同的社會比較意涵，而韓貴香的研究則直接以成就事件是否對互動對象造成威脅（被比下去）來操弄社會比較的效果。先就與互動對象關係的親近性對成就者如何歸因自己成就的影響來看，過去的研究習慣以「類化他人」為比較標的來探討與個人「自我增進」有關的行為（Krueger, 1998; Taylor & Brown, 1988）。嚴格說來，對著重個人主義思考模式的西方文化而言，這樣的比較可能是適當的，因為「他人」相對於自己來說都是他者，人際間的關係脈絡並不是那麼重要。然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華人社會，卻是一個以關係導向為主的社會（relationship-dominant society），處於不同關係情境中的個人，其適當的行為表現是依互動對象和自己的不同關係而定。Ho（1998）即強調在探討華人的社會行為時，應採取方法上的關係主義（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來探討個人面對不同關係對象時的反應。Gao（1998）的研究即指出對華人而言，關係親近者是我們可以分享成就喜悅和真實表達自我的自己人（insiders）。與自己人互動時，如果過於見外和客套，反會讓人有虛偽和矯情的不舒服感受。若此，在面對關係親近者時，對自己的成就採內在歸因（能力、努力）不僅可以增進個人的自我感受，也可以突顯與這些關係親近者共享的「面子」榮光。反之，對非關係親近者，由於雙方關係的情感基礎，並沒有深厚到可以任意表現出真實的自我（Hwang, 1987）。因此，不自誇這種受社會規範約束的歸因方式，自然成了個人向這些對象描述自我成就時的適切行為。循此，我們似乎可以合理地認為，要推論成就者會如何對他人歸因自己的成就，應將此互動對象的關係親近性納入考量。

此外，以成就事件的社會比較效果（威脅性）來看，Hwang 等人（in press）與陳舜文（2005）主要是認為「縱向傑出（社會成就目標）」與「橫向傑出（個人成就目標）」這兩類成就在本質上並不一樣，其造成的社會比較效果強度也有別。所以在與他人互動時，對較有社會比較效果而可能威脅到他人的縱向傑出成就應採外在歸因，但對較無社會比較色彩與較不具威脅性的橫向傑出成就則可以採內在歸因。此不同於韓貴香（2010）的研究觀點，是直接以成就事件對互動對象是否具有社會比較的威脅性來分析。若依韓貴香的觀點，則不管是橫向傑出或縱向傑出的成就，只要此成就威脅到對方，成就者應該都會採

外在歸因（運氣）的方式，來向對方解釋自己的成就而表現出謙虛，而此行為背後的原因，則是同理對方的感受並給對方留面子。相對地，在該成就事件不會威脅到對方時，依韓貴香的研究發現，成就者會如何向互動對象歸因自己的成就，要視此對象和成就者之間關係的親近程度而定。當對方為關係親近者時，個人基於榮耀分享的動機，會傾向將成就歸因於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反之，如果對方為非關係親近者，則基於不讚己長的社會規範，個人會將成就歸因於運氣，這也是前述韓貴香與陳舜文研究不一樣的地方。因此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將以橫向傑出（個人目標）的成就事件（歌唱比賽），重新檢驗華人大學生對自身成就的人際歸因方式，是受成就事件本身的類型（橫向傑出，較無社會比較意涵），或人際關係的特性（事件威脅性與關係親近性）影響，同時探討成就者在做人際歸因的同時，是否涉及不同的動機。

（四）謙虛取向的影響

雖然西方的學者認為，個人對自身的成就傾向做內在歸因，對失敗事件則做外在歸因的現象，是源於個人為了維持正向自我觀所產生的動機性偏誤（Greenwald, 1980; Steele, 1988; Zuckerman, 1979）。然而，對在儒家文化薰陶下成長的大學生而言，由於在其成長的過程中，個人並不被鼓勵對自己的成就或能力作過度的吹捧（Cai, Brown, Deng, & Oakes, 2007; Kurman, 2001, 2003），因此，在有所成就時，自然也不若西方人般容易表達對自己的正面評價。王晴巧與孫蓓如（2007）即指出，華人特有的負向自我描述，如自謙等，其實可視為華人從事印象整飾的策略之一，個體並非如其宣稱地認為自己差，而是想要獲得他人覺得自己是個有教養者的正向評價。因此，在人際和諧的情境中，基於社會謙虛規範的約束力，華人傾向將自身的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應是一合理的推論。不過，這樣的推論卻和韓貴香（2010）的研究結果不盡吻合，因為該研究的主要結果發現：基於「不讚己長」社會壓力而表現出來的謙虛，主要是表現在面對非關係親近者的情境。在互動對象為親近他人時，其研究參與的大學生對成就的主要歸因方式是能彰顯自我的「能力」和「努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韓貴香的研究結果亦發現：即使在成就事件不會威脅到關係親近者（父母）時，仍有超過三成的研究參與者選擇做外在歸因（運氣和題目簡單）。在這樣的情況下，僅以社會規範的約束力來解釋，則可能過於簡單。如前所述，在自己的成就對對方不具威脅時，謙虛並非對自己人的適切反應，換言之，謙虛規範在此情境下應不具拘束力或不適用。如此，則有沒有可能是這些「過度」習於對自己的成就謙虛者，是因其其在成長的過程中，不僅學會遵守謙虛的社會規範，甚且，相較於將成就做內在歸因者內化了更強的謙虛信念，而使謙虛成了自己的一種行為傾向和特質，此則是本研究想檢驗的第二個研究議題。

三、研究問題

綜合前述對「縱向傑出（社會成就目標）」與「橫向傑出（個人成就目標）」成就事件類別的社會比較效果（陳舜文，2005；Hwang et al., in press），以及韓貴香（2010）以成就事件對互動對象是否具有威脅性和雙方關係親近性的分析觀點。本研究將以橫向傑出（個人目標）的成就事件（歌唱比賽），檢驗兩個相關的研究問題：

（一）大學生對自身成就的人際歸因方式，是受成就事件本身的類型（橫向傑出，較無社會比較意涵）影響，或人際關係的特性（事件威脅性與關係親近性）影響。

（二）成就者在對不同關係對象做人際歸因時，其背後是否涉及不同的動機。

此外，韓貴香（2010）的研究結果發現：即使在成就事件不會威脅到關係親近者時，仍有超過三成的研究參與者選擇做外在歸因，此可能和個人內化的謙虛取向強度不同有關。因此，本研究針對此提出研究問題：

(三) 在互動對象為關係親近者，且此成就並不會威脅到此對象時，對自己的成就仍傾向採外在歸因者的謙虛取向分數高於將成就做內在歸因者。

方 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參與者為選修「心理學導論」與「社會心理學」課程的學生，本研究共發出二百份問卷（四種版本各五十份），回收的有效問卷一百九十二份，除一位沒有填答性別外，其中男性九十七人（50.5%），女性九十四人（49%）。

二、研究設計

採情境實驗法，利用故事建構操弄實驗情境，自變項有兩個：一為事件威脅性，設計為「會」和「不會」威脅到互動對象；另一為關係親近度，分為「關係親近」和「非關係親近」，因此是一個 2（事件威脅性：會 vs. 不會）X 2（關係親近度：關係親近 vs. 非關係親近）的二因子設計。為了避免不同的問卷情境並陳容易讓研究參與者猜到真正的研究目的，因此採受試者間（between-subjects）設計，每位參與者僅填答一種情境問卷。依變項則是研究參與者對該成就事件的歸因理由和動機，同時也測量研究參與者的謙虛取向分數。

三、研究工具

（一）成就事件的選擇與設計

在設計情境時，為兼顧成就威脅性和關係親近性的操弄是在同一種人際關係基礎上，並可以直接與陳舜文（2005）的研究結果做比較，因此選擇其研究所採用的歌唱比賽為情境故事背景。情境的主要內容敘述故事主角「子晴」是一位大學生，由於喜愛唱歌因此參加某一電視歌唱比賽，經過幾次激烈競爭後，子晴果然以優異的成績獲勝……。接下來情境便操弄子晴歌唱比賽獲勝之後，對不同關係對象歸因自己比賽獲勝的原因。

（二）關係親近度與事件威脅性

關係親近度主要是操弄有成就者和互動對象之間「親近」vs.「非親近」的關係，而事件的威脅性則是操弄子晴歌唱比賽的優異表現「會」vs.「不會」威脅到此互動對象。茲將此四種對象在問卷中的描述摘錄於下，問卷中除了這部份的操弄描述外，其餘均保持一致。

1. 關係親近/有威脅：子晴在班上有一個同樣喜愛唱歌的好友兼死黨亞旭，這次的歌唱大賽亞旭也報了名，可是，亞旭在進入決賽前因表現不理想而遭到淘汰……。

2. 關係親近/無威脅：子晴在班上有一個好友兼死黨亞旭，亞旭雖然不愛唱歌，但很鼓勵子晴參加這次的歌唱大賽……。

3. 非關係親近/有威脅：亞旭是子晴班上的同學，不過子晴和亞旭並不是特別熟識，私下的互動也不多。在比賽時子晴發現這次的歌唱大賽亞旭也報了名，可是，亞旭在進入決賽前因表現不理想而遭到

淘汰……。

4. 非關係親近/無威脅：亞旭是子晴班上的同學，不過子晴和亞旭並不是特別熟識，私下的互動也不多……。

(三) 情境操弄的有效性

為確認前述情境對於「關係親近度」和「事件威脅性」兩變項操弄的有效性，先以 60 位選修「心理學導論」的大學生（每種情境 15 人）進行操弄檢核。參與者在讀完情境故事後，需想像自己是故事主角子晴，並回答故事後附的操弄效果檢核題目。其一為評量子晴和互動對象的關係親近程度，題目的設計為「子晴與亞旭的關係親近程度如何？」研究參與者須依 9 點量表（1 = 一點都不親近；9 = 非常親近）評量該對象與子晴的關係親近度；其二為評量子晴歌唱比賽獲勝對對方的威脅性如何，題目的設計為「子晴歌唱比賽的優異表現會不會讓亞旭有被比下去了的感覺？」研究參與者同樣須依 9 點量表（1 = 一點都不會；9 = 非常可能）回答此問題。針對回收的 60 份情境操弄檢核問卷（男性 31 份，女性 29 份），以 *t*-test 檢驗參與者對關係親近者與非關係親近者的親近性評量，結果顯示其間有顯著差異（ $M = 7.23, SD = 1.22$ vs. $M = 3.13, SD = 1.35, t(58) = 22.28, p < .001$ ）。以同樣的方法檢驗事件威脅性操弄的效果，結果同樣顯示有威脅與無威脅的操弄兩者之間有顯著差異（ $M = 6.03, SD = 1.90$ vs. $M = 3.46, SD = 1.86, t(58) = 7.03, p < .001$ ）。此結果顯示，前述研究設計的情境，對於關係親近度和事件威脅性的操弄是有效的，並可將之用來當作正式施測的實驗情境。

(四) 有效樣本的檢驗

正式施測所用的情境是採上述已經檢驗過操弄效果的情境。不過為了確認研究參與者的確注意到情境故事所操弄的細節，正式施測時，仍要求參與者在讀完情境故事後回答故事後附的檢核題目。題目之一為確認亞旭和子晴的關係；其二為確認亞旭是否有參加歌唱比賽。如果研究參與者答錯檢核題，表示情境的操弄並不成功或填答者在回答問卷時並不用心。因此，在分析資料時會將這些問卷排除。

(五) 歸因理由

問卷在設計時，參考 Weiner（1986）、Yan 與 Gaier（1994）、陳舜文（2005）以及韓貴香（2010）等相關研究對成就歸因的分類方式（努力、能力、運氣、作業難易度等），配合本研究歌唱比賽的情境來設計可能的理由。由於 Weiner 在提出成就歸因的「能力」因素時，是著眼在個人天生的能力和天份此一內在但卻非個人可以控制的部份。而在本研究所設計的情境，對於參加歌唱比賽的業餘歌手而言，設計「我有歌唱能力」的對白似乎沒有「我有歌唱天份」貼近日常生活上的對話。因此，本研究將可能回答的歸因理由設計為：1. 我很努力嘛；2. 我運氣好啦；3. 我有天份啊；4. 那首歌剛好很容易唱；以及 5. 其他（請說明）。而選項 3. 我有天份在此研究中僅是天生能力的替代性表達。研究參與者在讀完情境故事後，需想像如果是故事主角子晴，在面對上述不同關係對象時，會選擇哪一種歸因理由（單選）。

(六) 歸因動機

仿韓貴香（2010）質化研究所分析的三種歸因動機（謙虛規範、榮耀分享和體貼對方），同時考量研究參與者選擇以能力和努力為解釋成就的理由時，也有可能和在西方文化中成長的人一樣，是為了維持「正向自我觀」，因此加入一「如果自己很棒，就應該說出來」的選項。此外，再增加一「其他」的選項以避免這四種動機仍有不足。問卷中的選項描述為：1. 和對方分享自己歌唱比賽優勝的喜悅；2. 體貼對方的感受並保護對方的面子；3. 如果覺得自己很棒，就應該說出來；4. 做人不可以驕傲，所以不應該誇口自己的成就；5. 其他（請說明）。研究參與者在選擇完人際歸因的理由後，接下來須由上述的不同動機中，挑選一項自己之所以這樣向對方解釋自己歌唱比賽獲勝的原因（動機）。

(七) 謙虛取向量表

雖然謙虛在華人社會中是個普遍的概念，可惜目前仍未有針對華人設計和發展的中文謙虛量表。因此，本研究參考 Kurman (2001, 2003) 比較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文化個人謙虛取向差異之謙虛取向量表。此量表原文為英文，由研究者先翻譯成中文，再請一位英文系的老師回翻成英文，以確保題目沒有偏離原來的題意。由於原量表的二十一個題目有些在題意上過於接近，因此，刪除相類似的題目例如「我想自誇是一件沒有禮貌的事」與「即使是真的很優秀，我還是覺得過度誇口自己的成就是很不禮貌的」之後保留十個題目，研究參與者需依六點量表（1 代表非常不符合；6 代表非常符合）圈選適合描述自己的數字。此外，為確保此十個題目的確是測量同一構念，研究者採最大估計法針對此 10 個題目進行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只有一個比較大的因素（Eigenvalues = 4.29），且此因素佔 49% 的變異量。此顯示：依題意來看，此 10 道題目的確是測量謙虛這一個構念。在尚無針對華人設計的謙虛量表的情況下，此量表應該是一適當的測量工具。此十個題目在本研究中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alpha = .76$ ，分數分布在 22 ~ 54 分之間。

四、研究程序

本研究是以情境問卷為研究工具，採團體施測的方式在研究者任課的班級進行。由於研究的四種情境是採受試者間設計，因此在分派問卷以前，先以隨機的方式將四種不同的問卷版本加以混合，每位研究參與者僅回答一種情境問卷。

五、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的情境問卷在回收後，研究者先將答錯檢核題、答題不完整以及歸因理由無法分類的問卷排除。之後再將問卷的資料鍵入個人電腦，並利用 SPSS14.0 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分析方法如下：

(一) 以卡方同質性和卡方適合度考驗法，檢驗在不同情境研究參與者對不同歸因理由和歸因動機的人數分佈有無差異（研究問題 1 和 2）。

(二) 以 t 考驗檢驗在不同情境中（特別是在關係親近/無威脅），採內在歸因或外在歸因者的謙虛取向分數有無差異（研究問題 3）。

結 果

研究共發出二百份情境問卷，回收兩百份，在回收的問卷中有五位研究參與者答錯檢核題，一位回答問卷不完整，因此在分析時直接將這些問卷排除。此外，有兩位填答者圈選的歸因理由為「其他」，其中一位說明自己會回答「謝謝你，然後微笑」，另一位表示會回答「都是因為有你的加油」，由於無法將這兩份問卷歸類，因此將之排除。最後研究分析的有效問卷共一百九十二份（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96%）。其中關係親近/無威脅的問卷為四十七份，非關係親近/有威脅的問卷四十七份，關係親近/有威脅的問卷為五十份，以及非關係親近/無威脅的問卷則為四十八份。

在開始分析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之前，先檢驗研究參與者對成就事件所選擇的歸因理由有無性別效果，結果發現性別和歸因理由之間並無關聯 ($\chi^2(3, N = 191) = 2.59, p > .05$)，因此，後續的分析直

接排除性別效果的考量。

一、歸因理由的檢驗

茲將四種版本的研究參與者選擇的歸因理由和動機整理於表 1。需先說明的是在進行卡方分析時，倘遇到自由度 (df) = 1 而且理論次數 (不是觀察次數) 又小於 5 的時候，必須進行耶茲氏校正 (Yate's correction for continuity) (林清山, 1992)。經檢查表 1 雖然有幾個細格的觀察次數小於 5，但此研究在檢驗其研究問題時所進行的卡方分析，並沒有剛好同時吻合上述這兩種情況者 (有 0 的細格 SPSS 內鍵的程式會自動忽略且不計算自由度)，因此本研究是直接採未校正過的卡方值來判讀其顯著性。

為回答研究的第一個問題，華人對自身「橫向傑出」成就的人際歸因，是受成就事件本身的性質 (個人成就目標)，或人際關係的特性 (事件威脅性與關係親近性) 影響。在分析時先以 χ^2 同質性考驗法，檢驗研究參與者對四種不同關係對象所做的歸因有無顯著差異。結果發現，參與者對不同關係對象選擇的歸因理由的確有差異 ($\chi^2 (9, N = 192) = 73.80, p < .001$)。進一步以 χ^2 適合度考驗法檢驗，發現在「關係親近/無威脅」的情境中，研究參與者選擇的歸因理由雖然四種都有，但其間的差異達顯著 ($\chi^2 (3, N = 47) = 18.28, p < .001$)，其中「努力 (41%)」和「運氣 (38%)」同是主要的歸因理由，其次是「天份 (19%)」，至於「歌曲容易 (2%)」則是最不被選擇者。至於在「關係親近/有威脅」、「非關係親近/有威脅」以及「非關係親近/無威脅」的情境，絕大多數的研究參與者都是選擇「運氣」為主要的歸因方式 (分別為 $\chi^2 (2, N = 50) = 53.56, p < .001$; $\chi^2 (2, N = 47) = 57.49, p < .001$ 以及 $\chi^2 (2, N = 48) = 58.63, p < .001$)。

表 1 研究參與者對不同關係對象所選擇的人際歸因理由和動機之次數分布

歸因理由		互動對象			
		關係親近/無威脅 (n = 47)	關係親近/有威脅 (n = 50)	非關係親近/有威脅 (n = 47)	非關係親近/無威脅 (n = 48)
努力	社會規範	3	0	0	1
	體貼對方	19	3	1	4
	正向自我	(41%)	(6%)	(2%)	(8%)
	榮耀分享	13	1	1	2
天份	社會規範	0	0	0	0
	體貼對方	9	0	0	0
	正向自我	(19%)	0	0	0
	榮耀分享	5	0	0	0
運氣	社會規範	7	6	10	25
	體貼對方	18	41	40	41
	正向自我	(38%)	(82%)	(85%)	(86%)
	榮耀分享	11	1	4	9
容易	社會規範	0	1	2	0
	體貼對方	1	6	6	3
	正向自我	(2%)	(12%)	(13%)	(6%)
	榮耀分享	1	1	1	3

二、歸因動機的檢驗

同樣先以 χ^2 同質性考驗法，檢驗研究參與者對四種不同關係對象所選擇的歸因動機有無不同。結果發現其間的確有差異 ($\chi^2(9, N = 192) = 95.76, p < .001$)。進一步以 χ^2 適合度考驗法檢驗，發現在「關係親近/無威脅」的情境中，研究參與者選擇的主要動機是「榮耀分享」($\chi^2(3, N = 47) = 40.57, p < .001$)。在「關係親近/有威脅」和「非關係親近/有威脅」的情境，研究參與者選擇的主要動機都是「體貼對方」(分別為 $\chi^2(3, N = 50) = 70.48, p < .001$ 以及 $\chi^2(2, N = 47) = 18.17, p < .001$)。至於在「非關係親近/無威脅」的情境，絕大多數的研究參與者則是選擇「謙虛規範」為主要的動機 ($\chi^2(3, N = 48) = 28.83, p < .001$)。

三、謙虛取向效果的檢驗

本研究要回答的第三個問題是，在特別是成就事件不會威脅到關係親近者的情況下，仍選擇對自己的成就做外在歸因(運氣和題目簡單)者，相較於將成就做內在歸因(努力和天份)者內化了更強的謙虛信念，因此其謙虛取向分數應會較高。在分析之前，先將研究參與者在此量表十個题目的得分加總為其謙虛取向總分，再將「運氣」和「歌曲容易」合併為外在歸因，「努力」和「天份」合併為內在歸因。茲將不同情境的研究參與者選擇內在歸因和外在歸因者的人數、謙虛取向平均數和標準差整理於表二。

表 2 不同情境選擇內在歸因 vs. 外在歸因者的謙虛取向平均數

歸因對象 歸因動機	歸因對象			
	關係親近/無威脅	關係親近/有威脅	非關係親近/有威脅	非關係親近/無威脅
內在歸因	<i>n</i> = 28	<i>n</i> = 3	<i>n</i> = 1	<i>n</i> = 4
	<i>M</i> = 33.93	<i>M</i> = 34.00	<i>M</i> = 33.00	<i>M</i> = 33.25
	<i>SD</i> = 4.05	<i>SD</i> = 3.61	<i>SD</i> = 0.00	<i>SD</i> = 3.50
外在歸因	<i>n</i> = 19	<i>n</i> = 47	<i>n</i> = 46	<i>n</i> = 44
	<i>M</i> = 37.68	<i>M</i> = 35.06	<i>M</i> = 33.73	<i>M</i> = 34.11
	<i>SD</i> = 4.24	<i>SD</i> = 4.30	<i>SD</i> = 4.71	<i>SD</i> = 4.51

在分析時，直接以 *t*-test 針對關係親近/無威脅這一情境的研究參與者，比較其選擇內在歸因和外在歸因者的謙虛反應分數有無差異，考驗結果顯示此兩組之間的謙虛分數有顯著差異，內在歸因組的謙虛取向分數低於外在歸因組(內在歸因組 *M* = 33.93, *SD* = 4.05, *N* = 28; 外在歸因組 *M* = 37.68, *SD* = 4.24, *N* = 19; *t*(45) = -3.06, *p* < .01)。至於其他三種情境由於人數差異過大，因此沒有太多比較的實質意義，且採 *t*-test 分析的結果，內在歸因組和外在歸因組的謙虛分數都無顯著差異(分別為關係親近/有威脅：*t*(48) = 0.96, *p* > .05; 非關係親近/有威脅：*t*(45) = 0.216, *p* > .05; 非關係親近/無威脅：*t*(45) = 0.89, *p* > .05)。

四、小結

本研究以歌唱比賽為研究情境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即使是對較不具社會比較效果的「橫向傑出」而言，研究參與者對此成就的人際歸因理由亦不盡然就是努力，而是要看互動對象是「誰」而定。當對方為關係親近且此成就又不會威脅到對方時，基於「榮耀分享」的動機，「努力」和「運氣」的確都是研究參與者主要的歸因理由。不過，當自己的成就會威脅到對方時，研究參與的大學生基於體貼對方的感受，會將成就歸因於運氣。值得注意的是，當事件不會威脅到對方但和對方並不熟悉時，參與研究的大學生仍是將成就歸因於運氣，不過動機則是基於「社會謙虛規範」的影響。此外，研究還發現在面對關係親近且自己的成就又不會威脅對方時，會將成就做外在歸因者，其謙虛取向分數明顯高於採內在歸因者。

討 論

整體而言，本研究採歌唱比賽為研究情境的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大學生在對他人解釋自己的成就事件，會採內在歸因（努力、能力）或外在歸因（運氣、作業容易），基本上和成就事件本身的性質是「橫向傑出/個人成就目標」或「縱向傑出/社會成就目標」（陳舜文，2005）無關，而是受到該成就會不會威脅到對方，以及互動對象和自己的關係親近程度而定（韓貴香，2010）。在成就會威脅到對方的情況下，不管雙方的關係親近與否，研究參與者都是傾向將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特別是運氣）。當此成就不會威脅到對方時，如果互動對象是非關係親近者，研究參與者基於謙虛規範會將成就歸因於運氣；不過，當此對象為關係親近者，個人在歸因自己的成就時則可以比較隨性，分析研究所收集到的資料（表 1）發現，多數的研究參與者會將成就歸因於自己的內在因素。研究同時以謙虛取向量表檢驗在此情境中（關係親近/無威脅），個人對其成就會歸因於內在因素或外在因素是否受其內化的謙虛信念影響，研究結果支持這樣的想法，對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者之謙虛取向分數顯著高於將成就歸因於內在因素者。

本研究的結果也發現，當自己的成就會威脅到對方的自我，以及事件雖不會威脅到對方但和對方並不熟悉時，研究參與者都是傾向將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特別是運氣），不過在其成就「會」或「不會」威脅到對方的情況下，對成就謙虛的動機其實很不一樣。在自己的成就會威脅對方，謙虛的動機是基於體恤對方的感受，此是一種同理心的表現，謙虛不但可以給對方保留面子，也可以維護雙方之間關係的和諧（彭泗清，1993；楊國樞，1992）；在成就不會威脅到對方，但和對方又不是太過熟識時，將成就歸因於外在因素的運氣，則是基於「社會謙虛規範」而表現出來的教養行為，並可藉此得到互動對方正面的評價（王晴巧、孫蓓如，2007）。

過去的研究顯示華人大學生在向外歸因自己的成就時，會謙虛地將自己的成就歸因於運氣（Bond et al., 1982; Stipek, Weiner, & Li, 1989）。本研究則更進一步發現，即使是在人際和諧的情況下，華人大學生也可能和西方人一樣採可以自我增進的方式歸因自己的成就，而不一定總是表現謙虛。只不過由於整個社會規範的氛圍強調「不讚己長」，因此，強調自己努力或能力的自我增進行為，比較是表現在關係親近者之間，而且是在此成就不會威脅到對方的情況下，此和韓貴香（2010）的研究結果一致。就如 Gao（1998）所言，情感性關係是我們分享成就喜悅，也是可以真實表達自我的對象，與之互動時如果過於見外和客套，反會讓人有虛偽和矯情的不舒服感受。

一、本研究的理論和實務貢獻

本研究的結果對於理論和實務上都有其價值和貢獻。在理論方面，Hwang 等人 (in press) 認為，由於「縱向傑出」(社會成就目標) 涉及內團體或社會重視的目標；而「橫向傑出」(個人成就目標) 則是個人基於興趣所設立的目標。由於此兩種傑出所代表的社會比較意涵並不一樣，因此，個人在對他人歸因此兩種成就時，對屬縱向傑出的成就(學業)，會以「運氣」來解釋；但對屬橫向傑出的成就(唱歌)，則會歸因於努力(陳舜文，2005)。然而，本研究針對橫向傑出的歌唱比賽操弄成就事件會與不會威脅到互動對方的情境，結果顯示只要此成就會威脅到對方，研究參與者就會將成就歸因於運氣。也就是說，成就事件的類型雖然具有不同的社會比較意義，但本研究所探討的該成就是否會直接威脅到此互動的他者，對預測大學生在有所成就時會不會採謙虛的人際歸因方式，應該是更有意義和有預測力的因素。

在實務上，本研究的結果則有益於對真實人際互動的理解，以採取有效和有利於維持人際關係的行為。在個人的成就會威脅到對方的情況下，不管此讚美自己的他者和自己的關係親近與否，基於同理心的考量，此時成就者適當的回應方式是謙虛，甚且，互動雙方在成就者回應謙虛之後，此一主題的社會互動就應該結束，或轉移另一個話題。因為至此雙方都盡了彼此社會互動的義務，讚美者已經表達了佩服的風度，而成就者也回應了同理的謙虛。但在自己的成就並不會威脅到對方的情況下，則成就者回應了謙虛之後，此社會互動並未停止。依 Han (2011) 採謙虛腳本(modesty script) 的觀點來看，此時成就者表現的謙虛其實是開啓了一個社會互動的腳本，成就者謙虛之後，期待的是互動的對方能否否定自己的謙虛並更進一步的稱讚自己，如此，可以增進成就者的自我價值，並維持成就者和讚美者之間的人際關係之和諧。也就是說，雖然成就者在面對不同的人際關係時，都可能對自己的成就採外在歸因，但其謙虛背後不同的動機，其實意謂著之後不同的人際互動的適當性，特別是在此成就對個人並不具威脅性的情況下，對此成就者不吝多讚美幾句，可以有效維持雙方之間彼此的關係。

二、本研究在方法上的限制

本研究在探討大學生的成就歸因時，是採 Weiner (1986, 2000) 的四種分類：能力、努力、運氣與作業難易度。前兩項通常被合併視為內在歸因(internal attribution)，因為不管是能力或努力，都意謂著個人本身是事件成功的主要因素；後兩項則被稱為外在歸因(external attribution)，因為不管是運氣或作業容易，都是外在於個人的因素。雖然直接將成就的歸因方式做此四種分類略嫌簡單，對成就歸因的因素是否只有 Weiner 所提的這四個因素也有不少人質疑。但相關的研究搜集各種可能的成就歸因內容後，再以因素分析的方法檢驗，則發現不同的歸因內容，最後其實多是反映上述 Weiner 的四種分類(Meyer, 1980; Weiner, 1986)。也因此，以能力與努力(內在歸因)、運氣和作業容易(外在歸因)來探討成就歸因，是一被普遍接受的概念(Arkin, Cooper, & Kolditz, 1980; Campbell & Sedikides, 1999; Mullen & Riordan, 1988; Yan & Gaier, 1994)。

本研究和過去相關的研究在方法上不同之處，在於過去的研究是要求研究參與者同時評量四種不同歸因理由(能力、努力、運氣、作業難度)的可能性(重複量數)，在分析時則同時比較此四個理由，此時碰到的難題常常是運氣(外歸因)和努力(內歸因)同時都被評量為高分，因此在區辨其究竟為謙虛或自我增進的行為時就不是那麼有說服力(周欣樺，2002；陳舜文，2005)。因此，本研究在依變項的處理，是將四種不同的歸因理由當成單選題，參與研究的大學生在讀完情境故事後需由此四項理由中，選出一項自己會對互動對象(依情境版本不同而異)解釋自己成就的理由，如此，則可以很清楚地區分內在歸因和外在歸因的效果。這樣的測量方式，雖然忽略成就者可能同時考量不同歸因理由的情

況，但卻也提供相關研究採另一種角度來看華人對成就謙虛的表現。此外，由於此研究是採情境實驗法，單選題的設計其實更貼近真實的人際互動。因為成就者在面對他人的讚美時，回應對方自己成功的理由常常是一整體概略式的表達，例如「運氣啦」或「我很努力啊」。會一項一項針對「能力」、「努力」、「運氣」和「作業容易度」分別作評量，則應該是發生在成就者私下分析自己為什麼會成功的情況。因此，單選題的設計可能更適合本研究所採的情境實驗法，以探討真實人際互動時成就者如何對他人解釋自己成功的原因，而其缺點是可能限制了大學生對自身成就歸因內容的想法和表達。

雖然本研究是採紙筆測量的情境實驗法，研究所獲得的結果，僅能看成是研究參與者在虛擬情境下的想像反應。然而，以情境故事編製的研究方法，有其在施測和資料分析時的方便之處，且透過設身處地的情境想像，研究參與者其實並不會隨意亂答。因此，依此方法所獲致的結果，雖是屬於對相關情境應該如何回應的想像，但仍應具有高的可推論性。不過，不可否認的，以情境實驗法來進行研究也有其限制，特別是為了使研究結果明確，常常會刻意控制操弄的情境，使之盡可能單純。但這樣的情境設計卻可能和真實生活中人們的實際互動有所出入。例如真實生活中可能不像研究設計描述的只面對好友一人的單純情況，而是碰到好友時還混有其他非關係親近者在場；或者是雙方的互動並非私下，而是多人在一起的公開情境。在這類真實的社會互動情境中，成就者表現出來的歸因方式和歸因動機，可能就牽扯到更複雜的心理歷程，而需要再做進一步的研究分析和探討。

三、未來研究的建議

總結來說，本研究的結果，雖可以有助於我們釐清過去文獻對華人大學生在公開表述自我的成就時，究竟是自我增進或謙虛的爭論，但仍應該注意的是此研究是以「個人」的角度出發，來探討大學生在面對不同的關係對象時，會如何對自身的成就做歸因。然而，由於儒家文化不若西方文化是以個人獨立的「自我」為界線，而是常常將和自己親近的他人納進自己的「大我」中（李美枝，1993）。因此，個人的成就常常不僅僅是個人的成就，也是可以納入此「大我」中的他人的面子之所繫。因此，換個角度來想，大我中的成員（父母）在和別人互動時，對於家人（子女）的成就是否同樣會表現謙虛，則是個有趣的議題，值得未來的研究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另一方面，本研究認為華人大學生雖然習於對自己的成就表現謙虛，但此並不意謂其不會或不需要自我增進以提升自我的感受，而是這種狀況必須是在面對情感親近的家人或好友之間。然而，可以再進一步細問的是：謙虛難道是東方社會的專利？西方文化中的個人難道就不會表現謙虛？未來的研究可以針對東、西文化下成長的個人在面對不同人際關係對象時，對自己的成就會、否表現謙虛，以及其背後的動機如同理心和社會規範的約束效果有無不同，做進一步的比較和探討。

參考文獻

- 王晴巧、孫蓓如（2007）：華人的自我呈現與自謙行為：一項實驗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27，119-173。
- 李美枝（1993）：從有關公平判斷的研究結果看中國人之己關係的界線。**本土心理學研究**，1，267-300。
- 周欣樺（2002）：**人際競爭情境和人際和諧情境中的歸因型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清山（1992）：**心理與教育統計學**。台北：東華。
- 胡金生、黃希庭（2006）：華人社會中的自謙初探。**心理科學**，29，1392-1395。
- 陳舜文（2005）：**華人的社會目標與成就動機：以台灣大學生為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彭泗清 (1993)：中國人「做人」的概念分析。《本土心理學研究》，2，277-314。
- 楊國樞 (1992)：中國人的社會取向：社會互動的觀點。載於楊國樞、余安邦（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87-131）。台北：桂冠。
- 樊景立、鄭伯壘 (1997)：華人自評式績效考核中的自謙偏差：題意、謙虛價值及自尊之影響。《中華心理學刊》，39，103-118。
- 韓貴香 (2010)：華人對成就的人際歸因方式與動機之分析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2，39-76。
- Arkin, R., Cooper, H., & Kolditz, T. (1980). A statis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self-serving attribution bias in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situ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8, 435-448.
- Baumeister, R. F. (1982). A self-presentational view of social phenomena.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1, 3-26.
- Bond, M. H., Leung, K., & Wan, K. C. (1982). The social impact of self-effacing attributions: The Chinese cas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8, 157-166.
- Cai, H., Brown, J. D., Deng, C., & Oakes, M. A. (2007). Self-esteem and culture: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self-evaluations or affective self-regard?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0, 162-170.
- Campbell, W. K., & Sedikides, C. (1999). Self-threat magnifies the self-serving bias: A meta-analytic integration.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3, 23-43.
- Crittenden, K. S. (1996). Causal attribution processes among the Chinese. In M. H. Bond (Ed.),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pp. 263-279).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rh, J. L., Dobbins, G. H., & Cheng, B. S. (1991). Culture relativity in action: A comparison of self-ratings made by Chinese and U.S. worker. *Personnel Psychology*, 44, 129-147.
- Gao, G. (1998). "Don't take my word for it."—Understanding Chinese speaking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2, 163-186.
- Greenwald, A. G. (1980). The totalitarian ego: Fabrication and revision of personal hist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5, 603-618.
- Han, K. H. (2011). The self-enhancing function of Chinese modesty: From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scrip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 258-268.
- Heine, S. J., Lehman, D. R.,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9). Is there a universal need for positive self-regard? *Psychological Review*, 106, 766-794.
- Helmreich, R., Aronson, E., & LeFan, J. (1970). To err is humanizing sometimes: Effects of self-esteem, competence, and a pratfall on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259-264.
- Hewstone, M. (1989). *Causal attribution: From cognitive processes to collective beliefs*.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 Ho, D. Y. F. (1998).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relationship dominance: An analysis based on 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 1-16.
- Hwang, K. K. (1987). Face and favor: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944-974.
- Hwang, K. K., Chen, S. W., Wang, H. H., & Fu, B. J. (in press). Life goal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value of effort in Confucian society. In U. Kim & Y. S. Park (Eds.), *Asia's educational miracle: Psycholog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NY: Springer.
- Krueger, J. (1998). Enhancement bias in descriptions of self and oth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4, 505-516.

- Kurman, J. (2001). Self-enhancement: Is it restricted to individualistic cultur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7, 1705-1716.
- Kurman, J. (2003). Why is self-enhancement low in certain collectivist cultures? An investigation of two competing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4, 496-510.
- Leary, M. R. (1999). Making sense of self-esteem.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8, 32-35.
- Leung, M. (1996). Social network and self-enhancement in Chinese children: A comparison of self-reports and peer reports of group membership. *Social Development*, 5, 146-157.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253.
- Meyer, H. H. (1980). Self-appraisal of job performance. *Personnel Psychology*, 33, 291-295.
- Miller, D. T., & Ross, M. (1975). Self-serving biases in the attribution of causality: Fact or fic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2, 213-225.
- Mullen, B., & Riordan, A. C. (1988). Self-serving attributions for performance in naturalistic settings: A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8, 3-22.
- Steele, C. M. (1988). The Psychology of self-affirmation: Sus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self.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1., pp. 181-227).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Stipek, D., Weiner, B., & Li, K. (1989). Testing some attribution-emotion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109-116.
- Tafarodi, R., Marshall, T., & Katsura, H. (2001). *Standing out in Japan and Canada*. Paper presented in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Conference, Melbourne, Australia.
- Taylor, S. E., & Brown, J. D. (1988). Illusion and well-being: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 193-210.
- Tesser, A. (2000). On the confluence of self-esteem maintenance mechanism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4, 290-299.
- Weiner, B. (1986).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motivation and emotion*. New York, NY: Springer.
- Weiner, B. (2000).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theories of motivation from an attributional perspectiv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2, 1-14.
- Yan, W., & Gaier, E. (1994). Causal attributions for college success and failure: An Asian-American compariso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5, 146-158.
- Zuckerman, M. (1979). Attribution of success and failure revisited: The motivational bias is alive and well in attribution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7, 245-287.

收稿日期：2010年09月30日

一稿修訂日期：2010年12月08日

二稿修訂日期：2011年02月24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1年02月24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2, 43(3), 701-716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The Effects of Threat of Event, Closeness, and Modesty Orient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for Horizontal Distinctiveness

Kuei-Hsiang Han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nd Core Curriculum
Tamkang Univers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how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for their success was affected by the type of achievemen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their modesty orientation. Two hundr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nd 19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dopting scenario experimental method, this study manipulated the variables of "threat of successful event" and "closeness to the interacting target" in an achievement of horizontal distinctiveness.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participants' choice of attributional reason and motivation, in addition, their modesty scores were measured as well. The results of χ^2 analyses showed that when the success was a threat to the interacting target, participants would attribute their success to "luck" with a motivation of "empathy". When the achievement was not a threat, participants would attribute their success to "effort" and "ability" with intimates with a motivation of "sharing glory", but to "luck" with acquaintances with motivation of "obeying social modest norm". Moreover, the results of *t*-test revealed that when the success was not a threat to the intimate, the modesty orientation scores of those who attributed their success to external facto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ho attributed their success to internal factors.

KEY WORDS: closeness of relationship, horizontal distinctiveness, 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modesty, threat of event.